

# 往矣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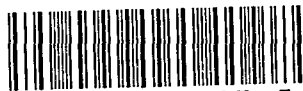
朱樸

在過去十數期的『古今』中，雖然名作如林，無篇不精，但是讀者所最歡迎各方所最注意的，當推周佛海先生爲第一名。

第三期的『苦學記』，第九期的『自反錄』，第十三期的『感衰閱盡話滄桑』，每一篇文字刊出後，中日各報，紛紛轉載，南北讀者，競爭購買；這種盛況，至少可說是四五年來國內文壇上所未親的了。

周先生的文章事業，早已彰彰於國人之耳目，毋待贅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眾之熱烈歡迎，依我個人的分析，全在於一個『真』字。一般人讀了三國志及水滸傳兩部小說，沒有不對於張飛李逵二人引起無上的敬愛者，無他，因爲張飛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個『真』字的表現而已。

我和周先生正式訂交雖然還不過是最近四五年來的事，但是意氣相投，肝胆相照，遠過數十年的故交。（這裏有一段趣事可以補述的



3 0661 5313 5

：二十多年前我和周先生爲了辯論一個經濟學上的理論問題曾在時事新報及民國日報上大起筆戰，後來邵力子也加入我的『敵方』助戰，我因寡不敵衆，不得已遂鳴金收兵！）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熱烈，待人之真誠，行爲之依義，沒有一個比得上周先生的。『言爲心聲』，他的文字完全是他人格之表現，至性至情，絕無半點虛飾。尤其是最近數年來周先生的孤臣孽子之心，絕非一般普通人所能知道及了解的。不佞忝在文末，深知其處境之艱，用心之苦，因而益堅其敬愛之心。

我們爲了窮於應付一般讀者補購第一冊古今合訂本的請求，遂有出版『古今叢書』之計劃。現在我們先將周先生專爲古今所寫的三篇特稿並附有關周先生的文字二篇彙集出版專集，作爲古今叢書第一種；以後並將陸續出版第二種，第三種，……，預定翼公先生之『歸程』爲第二種，梁衆異先生之『爰居閣脞談』爲第三種。藉爲推動近代文化之一助。區區微意，或爲一般讀者及關心文化之士所樂聞歟？

中華民國卅二年一月一日朱樸謹識於上海古今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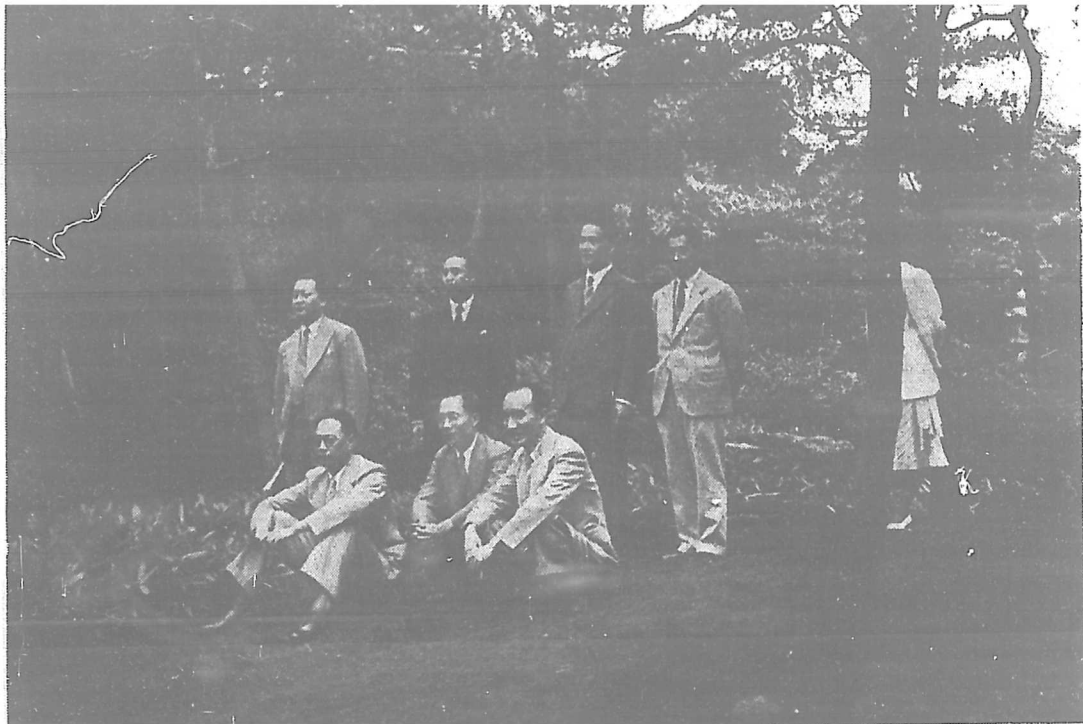


影近耆耄



庭家之者著

民國二十八年著者隨汪主席游日攝影



往矣集目次

往矣集序 ..... 朱樸

苦學記 ..... (三)

盛衰閱盡話滄桑 ..... (二七)

自反錄 ..... (七九)

記周佛海先生 ..... 左筆(九)

訪周佛海先生一夕談 ..... 書生(一〇二)

(一) 苦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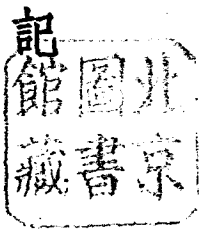


782.88  
821.6

樸兄屢次要我爲古今寫一篇東西。提起作文和講演，我現在比甚麼都怕。因爲還都兩年以來，以前所期冀，所談過的事，大部分沒有辦到。全面和平，遙遙無期，國府強化，尙待努力。所以我決心就自己的本位，就自己的責任，一聲不響的一點一滴的切實工作，非萬不得已，一不作文章，二不廣播，三不發表談話，四不公開講演。因爲以前說的話也太多了，既然大部分都沒有實現，還有甚麼意思向大衆說話？這便是我年來的心境。

不過古今的文字是軟性的，樸兄又再四相託，所以乘着星期日比較空閑的時候，把幼時苦學的經過，再來回憶一次，一則可以借此自己再鞭策一

# 苦學



番，二則對於現在在困窮中的青年，也許可以相當的鼓勵。

辛亥武昌起義的時候，我纔十五歲，在鄉村一個私塾裏讀書。第二年民國元年，我們鄉下有幾個學生，都進城考了高等小學。我的消息很慢，等到考期已過，我纔知道。於是請求母親准許進城運動補考。到了城裏探聽，知道距發榜的日子，只有三天，絕對不能再考了。我那時非常失望。湊巧那時縣政府的教育科長，是我鄉下的呂鶴立先生。我便請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學校長。居然得到允許了。因為這是我一生發軔的起點，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我一個表兄，當時在中學讀書，送我去考。補考的只有我一個人，在窗明几淨的校長室考的。國文題是『愛國說』，還有兩個加法的算術。國文完了卷就做算術。算術的答案，我沒有把握，湊巧這時校長不在房間，我的表兄在窗外探頭探腦的向內張望。我便把算術答案給他看。他輕輕的由窗外告訴我說

尾數上少了一個圈，於是我把圈加上，考試就算完了。考雖考了，究竟能不能取，還是一個問題。因為當時許多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好的老童生去投考，而名額又不很多，所以非常擔憂。那曉得發榜的那一天，我竟中了第一名。當時真是喜出望外！馬上帶信回家，報告母親，她老人家當然也非常歡喜。我自己想來想去，毫想不出何以會考得第一的理由，難道是校長徇教科長的情面嗎？後來進了學校，聽見閱卷的國文先生說，纔知道這個道理。原來我當時雖然在鄉下私塾，不知道從那裏弄得兩本梁任公的『中國魂』，讀得濫熟。我就學他的文筆，把許多新知識、新名詞以及憂時憤世的論調，裝入『愛國說』文裏去。在當時風氣未開的小州縣，居然有這樣的文章，當然要考第一了。

我因為是第一名進學校的，所以在學校裏風頭頗健，被選為班長。第一

年沒有甚麼事情；第二年開學之初，便發生問題了。原來學校裏有老生欺負新生的習氣。第一年我們被人欺負，第二年輪到我們欺負人了。有一次我們在上體操的時候，有一個新生坐在草地裏看。我們便說他不應坐着，要他馬上立起來。這位先生也很囂強，偏不立起。我們覺得太沒有面子，便私下商議散隊後把他圍着打一頓。居然三四人把他圍起來。我的一個年長同班，站在他的面前和他理論，並未動手。我立在他背面，先動手打他一拳。於是就大打起來了。被打的同學，到校長那裏去控訴。他只指出站在他面前的我的同班，而沒有指出我，因為我站在背後，他沒有看見。當時校規很嚴，我那個同班被開除了。我於是到校長那裏去自首，請求處分。校長說我沒有被控告，而且也愛護我，不加以任何處分。我覺得對不住那位被開除的同學，於是自動退學，和他一起到長沙去。決心下了之後，便回家報告母親。母親痛

誠了我一番之後，仍替我籌了五六十元錢，讓我出門。我父親早故，母親撫養着我和弟弟妹妹三人，艱苦度日，雖有薄田百餘畝，但是要籌幾十塊錢現款，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到了長沙，便進了湘西人士所辦的兌澤中學第二學期。當時小學是三年，中學是四年。我以小學二年級第一學期的學生插入中學二年級第二學期，功課實在不易趕。一因功課很難，二因用費很大，實在不容易支持。凌巧呂鶴立先生由教育科長調任爲縣裏的中學校長，我便請得兌澤中學校的轉學證書，轉入本縣的中學。呂先生勸我不要太躐級，功課不易趕上，便許我插入了第一學年的第一學期。小學還差一年半，洗了一個澡，便進了中學，在當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進了縣中之後，既然可以時常菽水承歡，又可以節省用費，所以便拚命用功。我雖然不敢說『幼有大志』，但是上進之心，却是有的，而且確有相當的抱負。但是就客觀

的事實看，上進發展的機會和可能，實在沒有。出洋？想都不敢想，那裏有這個希望！不單沒有出洋的希望，看見縣裏有一兩人進了北京大學，也只是徒然羨慕而已，根本不作此非分之想。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進高等師範。因為長沙有個省立高等師範，一切用費，都是政府供給。這是貧寒學生唯一可能的升學途徑。但是名額有限，而貧寒學生那樣多，所以進高等師範，也不過是幻想中的安慰罷了。我想萬一不能升學，能夠謀一縣政府的書記，或者小學教員，也就心滿意足了。在學校讀了一年多之後，遇着袁氏稱帝；護國軍興，沅陵是軍事上必爭之地，北軍源源入境，學校也就停學了。在家無事，想起我父親在洪楊之役，入了湘軍的幕，因軍功而出身，我何不也去投軍？於是在袁氏死後，便得了母親允許，又到了長沙，想謀一個司書的位置。旅居兩月，百計不成。湊巧學校又將開學，於是又回鄉重複上課。當時

臨邊鄧竹銘先生新來授歷史地理，深得他的賞識。那時我一面學做詩，一面讀東方雜誌等刊物，漸漸留心起政治來了。談到做詩，當時頗感興趣，師友又非常鼓勵，幼稚的作品，也做了不少。可惜到了日本之後，就不彈此調，現在一個字也做不出來了。初生犢兒不怕虎，當時膽子很大，到處題詩。沉陵位居沅水之側，城東波浪滔滔的江中淺灘上，有一小洲，上有龍吟寺，寺中有七級的龍吟塔。某年秋天，和同學去遊，在壁上題了一首詩，事隔二十五年，據湖南來人說，那首詩現在還在壁上。故鄉幼時釣遊之地，時在夢中，不知今生今世，還有沒有還鄉重溫舊夢的希望！那首詩雖然幼稚，現在還記得，特把它錄出，也可見當時的意氣了：

登高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

甘處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羣峯。



怒濤滾滾山河杳，落木蕭蕭宇宙空。

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

因爲留心政治，居然隱隱有以天下爲己任之氣概。不是我自己誇張，恐怕每一個不安分的青年，都是有這個雄心的。袁氏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某甲入閣，一下某乙入閣，在看報之餘，居然也想將來要入閣了。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併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爲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譬如課後要問同學『你甚麼時候到文昌閣去』便說：『你甚麼時候入閣？』但是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當時因爲常看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書籍，知道商務印書館有學徒學校，很想託人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做一名學徒，到上海去謀發展。但是就是

這一條路，想了很多的方法，也沒有走通。

命運之說，說不靈有時也覺得似乎奇怪。我一生的遭遇，總覺得都是命運的支配。我現在能夠有這樣地位，負這樣的責任，決不是我的聰敏才智所得到的結果，完全是僥倖。僥倖，就是命運。我作此說，好像是迷信，但是人定是否能勝天，確是一個疑問。我最怕的是辦財政和外交，而現在却不能不負財政的責任，且實際上常當外交之衝。我以為教育工作沉悶，極不感覺興趣，但是却做了三年大學教授和六年教育廳長，這樣事與願違，不是命運是甚麼？出洋留學，我做夢都不敢想。但是命運却造成我留學日本的機會，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我家距城二十餘里，在沅水的南岸，我每兩週返家省親一次。星期六回家，星期一進城，習以為常。每次步行，賞玩着沿途的青山綠水，倒也是一

件很愉快的事。民國六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發，沅江水漲，不能渡河進城，於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那曉得我一生的運命，就在這四天決定了，而我還在鄉下，一點不知。等到了學校，一個朋友對我說：『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去了，最近就動身。』我以爲他是開玩笑。他說：『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見校長。』見了校長，果然是真！原來我有個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東京，前一年把他叫到東京去了。他來信說東京生活程度並不貴，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我的好友鄔詩齋便發起湊錢送我去。呂先生立即拿出了三十元，那個時候的三十元，比現在的三萬元還要值錢。於是先生和同學，一共湊一百三十四元。我高興極了，雖然一年之後，不見得考取公費，但是這乃是唯一遠走高飛的機會，不能不冒相當的危險。於是立即回家，稟告母親。他老人家

極不願意，一則因為出洋兩字，使他老人家覺得要不知出多遠的門，捨不得我遠離膝下。二則因為如果考不取公費，家裏又無力接濟，深恐流落異邦。不過當時愛子和望子成名心切，只好忍痛一時，並且東挪西扯，爲我籌了幾十元，湊成了二百元。離家之日，母親不忍送我，躲在廚房中暗泣，我到廚房中揮淚拜別了母親，從此便成了天涯遊子了。以前雖然兩次到長沙，但是時間很短，而且路也不遠，所以還不覺得難過。現在出這樣遠的門，又不知何時還家。所以母子分離的痛苦，特別感覺得深刻。朝發蘆林潭口占說：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飢。

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回首風塵裏，中原血正飛。

詩雖幼稚，足見孺慕之心了。前幾年雖然兩次奉養來京，但是老人總不願久離家鄉，事變初起，就再回鄉。我參加和運之後，曾兩次派人奉迎，均

以路遠辛苦，沒有得到老人的允許。到現在音問隔絕，生死不明。寫到此地，真是痛不欲生了！

離開沅陵的時候，還有一段佳話：有一位女士，是我們同學的親戚，在桃源女中讀書，地方風氣未開，女子出門求學，當時實在是鳳毛麟角。我在同學家見過她三次，因為當時男女交際還不公開，所以從未交過一語，我當時在縣裏，微微有點小名，所以平常彼此都相當的傾慕。我在啓程的前兩天，忽然接得她一封信和四首詩，事隔二十餘年，詩已忘了，大意是仰慕和鼓勵，其中有『遙送君行暗舉觴』一句，因為『遙』和『暗』兩個字用得很多，所以我至今不忘。當時也回了她四首詩，現在都已忘記了。後來聽說她嫁了個外鄉軍人，很不得意。現在不知飄泊何方，可嘆！

同行還有兩個同學，三個人都不通日語。先到長沙，坐直航上海的船，

坐的不單是統艙，而且是運滬的米包上。當時懷着乘風破浪的壯志，也不知道甚麼是苦。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湖北人開的小棧房。三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人，到了五花八門的上海，簡直手足無所措。只好托棧房的人，買日金和船票，後來纔知道被他們騙去了不少的冤枉錢。

到了長崎上岸，有中國酒店四海樓派人來接，稍事休息，晚上就坐火車。開車不久，我忽想大解。當時不知道車上有便所，可以解手，每次停車，看見了 W.C. 想下去大解，又怕車開，所以一直忍了八九小時，到了門司纔得輕鬆，真是一個大笑話。車上買飯吃，看見筷子只有一根，有個同學說：『一根筷子怎好吃飯？』我自作聰敏的說：『折斷成兩根，不是可以吃嗎。』於是三人都折斷了，大家覺得日本筷子這樣短，真不方便。後來看見附近一個日本人吃飯，他吃飯拿着筷子，不是折斷，而是分開，於是三人相

視而笑。到了東京，按着地址，用筆談的方式，叫了三輛人力車，送到本鄉的福起館。於是有許多同鄉便來招待我們了。

到東京是七月底，於是開始學日語並補習其他科學。我雖是貧寒出路，但是用錢却面手不小，到了十二月，錢已用完了，今後怎麼辦呢？就算是公費考得取，也要到明年七月，以後半年怎麼支持？家裏接濟，是萬不可能的，真是天無絕人之路，那時湖南又發生南北內戰，匯兌不通，所有在東京的湖南自費生，都不能得到家庭的接濟，於是大家跑到公使館請求救濟，結果每人得了一百元，這又可以支持幾個月了。那時段合肥當國，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日本留學生，羣起反對，一面分派代表回國到北京上海去運動學生，一面鼓勵全體返國。留日學生到北京策動，和北京大學學生相聯繫，遂發生了所謂五四運動。國內國外的學生運動，相激相成，越鬧越大，於是東

京留學生大多數都主張回國了。我雖然是初到東京，但也是主張回國最激烈的一人。如今回國空氣已造成，我自己焉有不同回國之理。以前完全沒有想到個人問題，現在真要回國，於是個人種種難題，都不能解決。第一，旅館欠了三十餘元，有甚麼法子可以還清？三十餘元，現在覺得問題很小，當時實在比天還大。第二，回國的川資到那裏去籌？最要緊的，還是第三，到那裏去？到京滬去做愛國運動嗎？吃甚麼？生活都不能維持，能做甚麼運動？回老家嗎？不僅是沒有意義，而且好容易能夠出來，這一回去，就要老死溝壑，今生今世，再沒有出來的希望！不回國嗎？又萬萬不可以。於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真苦死了，好在我到處人緣都好，朋友都肯幫忙。有個朋友說，旅館欠債替我付。另一朋友為我籌三十元作川資。但是到那裏去呢？這個問題仍然不能解決。於是還有個朋友說：『你回國是不能不回的。但是飯



都沒有吃的，那能做愛國運動。我看你還是回國謀一位置，每月積一點錢，過幾個月再來罷。我有個朋友在奉天安東縣辦厘金，我介紹你到那裏去罷。」於是便坐車到下關，渡海到朝鮮，從朝鮮到了安東驛下車。厘金卡還在數十里的鄉下，於是再渡民船，沿鴨綠江而下。到那裏一看，滿目蘆葦，幾家土屋，真是荒涼得不能以文字來形容。那位同鄉看見我到，愁眉苦臉的說：「我這裏局面小極了；除我外只有八個巡丁，你來有甚麼辦法？既然來了，只好住一住再講。」於是我積錢再去留學的夢，又不能實現了。前途渺茫，走頭無路。當晚夢見回家，倒在母親懷中痛哭。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就想起母親的慈愛，也只有母親的慈愛，纔能鼓起我們的勇氣。這乃是天性。每日徬徨海濱蘆葦中，幾欲跳海自盡。私念此生休矣！想不到我的生命，會斷送到這樣荒涼的海邊。過了兩星期，接到東京朋友的信說，回國的

人並不多，第一高等學校，考期快到了，有許多人已報名，叫我何妨再去考一考。我想第一高等是最難考的，許多在國內有名的中學畢業，到東京預備了三四年，還有考不取的人。我中學沒有畢業，又只預備幾個月，那裏考得取？但是除了這條路之外，那裏還有第二條路可走？只得破釜沉舟的去！與其死在荒涼的海濱，不如到東京去流落！於是向那位同鄉借了二十元，沿路節食省用的到了東京，這個時候，已是一錢莫名了。不得已搬到原住的旅館，欠着眼住下去。這個時候，距考期只有二星期。名額只有五十名，而投考的却有六百多。我那裏會有希望？這三個星期中間，日以繼夜的趕着預備。到了考的那天，我只有半枝鉛筆，向朋友借了一毛錢，買一枝新的，並借了一件舊衣服穿上。因為沒有錢坐電車，所以把鉛筆放在衣袖內，緩步徐行的走去。照道理說，我心裏一定很慌。但是當時我却非常鎮定。一個人在

患得患失的時候，心裏一定着急。如果真的絕了望，也無所謂了。我當時斷定是考不取的，此次不過是盡人事而已，好像一個囚徒已經綁上法場，還有甚麼怕的。當時因為沒有心亂意煩，所以頭腦非常清楚。這不單是我一生的成敗攸關，而且是生死關頭，所以和當年考小學時候一樣，記得很清楚。上午考數學，四個算術題，兩個代數題，一個幾何題。我的性情，與數學極不接近，所以我認為第一場是個最大的難關。進了考場，把手向袖內一摸，昨天借一毛錢買的一枝新鉛筆，不知何時在路上丟掉了。預兆這樣不好，還有甚麼希望呢？索性死心塌地不管，拿着半枝鉛筆去解答。過了一小時後，做對了五個題目。還有一個代數題和幾何題沒有答案。看看時間還早，把幾何題拿來再做，却被我做對了。於是精神爲之一振，再去做那個代數題。出於意料之外的，也做對了。這一難關突破，我便生出多少希望來了。下午考英

日文的互譯。這一點我有相當的把握，成績也還不錯。於是第一天的考試，便覺得心滿意足了。第二天上午考物理化學。在國內既然沒有學過，到東京又沒有多預備。把兩本很厚的借來的書，悶悶的翻來翻去。看見有許多地方，有鉛筆的記號。我靈機一動，以爲這些都是要緊的地方，所以單選這些地方去死記。誰知第二天所出的題目，都是昨晚曾經死記過的。於是這個難關，又被突破了。下午考日文作文，便胡亂的做了一篇，也不知好歹。最後一個難關，就是日語的面試，這却把我爲難了。當時日語程度很不好，預備也來不及。只好聽天由命了。因爲我報名得晚，所以排在第四天面試。第三天下午，悶悶不樂，跑到中國青年會去看中國報。偶然遇見一個同考的，我問他已否面試。他說上午已經試過了。我便問他問些甚麼話。他說『還不是隨便問，例如你是湖南人，也許問你湖南打仗的情形。』我便跑去請一位老

留學生，編了一篇湖南打仗的情形，拿來死讀。第四天面試的時候，是一位叫做今井的老先生。他問你是周某人嗎？我說是的。他看看我的報名單，就說你是湖南省的人嗎？我又答一聲是的。他又問我說：『湖南現在打仗的情形怎樣？』我便把昨晚背熟的，滔滔不絕的讀了一篇。他便不問我第四句話了。如果他再問我一句，我便要窘態畢露了。於是全場考試，就此完結。

考的時候不着急，考完了倒急起來了。如果考不取，怎樣辦呢？想去公使館做一個當差的工友。萬一連這個都辦不到，就想到華僑的商店去謀當一名伙計。這樣胡思亂想的過了一星期，聽說發表了。趕快跑到學校去看榜。我想萬一我考取，一定名字列在最後。所以我不敢從第一名看起的往下看，却從最後一名倒往上看。看了一大半，沒有我的名字。我從頭上冷起，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腿尖倒下去的時候，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我

疑心是做夢，把舌尖重重的咬了一下，感覺得很痛，於是我知道不是夢，是真的。從此我生活不成問題了。從此我可以求學，一直到帝國大學畢業了。當時心中的愉快，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馬上寫信去報告母親。考第一的是郭心崧，現在昆明，做郵政總局局長；第二是以後成爲左翼作家的鄭伯奇，第三是重慶交通部次長彭學沛。

現在，和我當時一樣困苦的青年，不知道有多少。大家不要灰心，不要餒氣，不要落膽，不要絕望！天無絕人之路，一根草有一滴露水養的！只要我們肯幹，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可以從重重包圍之中，殺開一條血路！



(二)

盛衰閱盡話滄桑





## 盛衰閱盡話滄桑

祇要把從古到今的歷史，翻閱一遍，任何人都會感覺世事無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興亡之感。不過在紙面上閱讀所生的感覺，決沒有由實際經歷而發生的那樣痛切，那樣深刻。『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這類的滄桑之感，不是親身經歷，決不會體念出其中所含的無限變幻莫測的淒涼酸辛的味道。

我年齡不過四十餘歲，參加政治生活，也不過十六七年，所親自經歷的事情，較之幾朝遺老，革命先輩，當然要少得多，配不上說閱盡興亡，歷盡盛衰。不過自從中華民國成立，至今三十一年，在這個短短的時期之中所發

生的盛衰升沉的事實，實在比昇平時代一百年中所發生的要多得多！所以浮沉於這個三十一年中的人們，其所遭遇的變化，其所感覺的滄桑，一定比昇平時代的三十一年，要豐富而深刻得多。就我個人說，國民革命時代以前的變化，例如民初的雨後春筍般的政黨潮流的漲落，洪憲的興亡，以及以後北洋各系軍閥的走馬燈式的離合盛衰，雖然祇在報紙上閱讀，已經令人感覺得白雲蒼狗，變幻無窮了。自從國民革命以後，雖然祇有十九年，却親自經歷過許多突起突滅，時分時合，忽盛忽衰的悲劇和喜劇，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這樣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幾年，焉得不令人感覺得個人的事，無一不是空的，而發生消極之思呢？成固不足喜，敗亦何必憂。得固不足樂，失又何必悲。榮華富貴，權位利祿，轉眼皆空，何必勞形苦心於這些身外之物的追求和爭奪呢！

我是民國十三年五月由日本京都到廣州的。當時 國父任大元帥，正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共開始正式合作的時候。當時革命基礎，真是風雨飄搖，談不到穩固。我們且不說廣東省以外的各省，都爲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等大軍閥，以及其他許多小軍閥所盤踞；就是廣東省以內，陳炯明割據於東江，鄧本殷虎踞於南路，革命根據地，不過是廣州府屬及北江、西江的二十餘縣；我們且不說革命根據地以外的軍閥，就是革命根據地以內，那裏能夠統一指揮。當時有粵軍、湘軍、滇軍、桂軍。而最強有力的滇軍，却跋扈異常，桂軍力量雖不大，而作惡却是一樣。干涉行政，把持稅收，包庇烟賭，竟是無惡不作。粵軍湘軍，爲自存計，當然程度稍有差別，辦法也是一樣。而且在廣州，肘腋之下，還有和英國勾結的商團。在這種革命環境之中，當時誰也做夢都想不到四年之後，革命軍可以直

搗幽燕，完成北伐，使國民黨統一中國。從十三年下半年到十四年年底一年半的時間內，咆哮的商團解決了，跋扈的滇桂軍消滅了，負隅的陳鄧驅除了。當時氣餒薰天，炙手可熱的反革命和假革命的軍政巨頭，一個個抱頭鼠竄的亡命去了。革命政府，改爲國民政府，於七月一日成立了。在國民革命，固然是初步成功，在他們個人，何嘗不是從極得意的地位，變成極失意的情形？何嘗不是從有權力地位，變成了黃粱一夢！這些經過，我都親自經歷，有些而且參加的。在我們成功者歡欣鼓舞的一方面，正反映着別方面失敗者的垂頭喪氣。

正在這個時候的前後，本黨的領袖之間，因爲廖仲凱先生被暗殺一案爲發端，發生了極遽急，極激烈的分離和排斥的運動。外患甫平，內憂突起。十四年下半年至十五年上半年之交，黨內各領袖間關係變化之劇烈，真令人

目眩神迷。其中經過，不必詳叙，但是當時却不能不令我發生世變莫測的深刻的感慨。

十五年七月北伐了。當時對北伐的前途，誰也沒有絲毫把握。北伐軍隊，不過是七湊八湊而成的七八萬人。無論在數量方面或質量方面，都趕不及盤踞長江上下游的吳佩孚及盤踞長江中下游的孫傳芳的軍隊。（張作霖的軍隊，還不在內。當時的策略，是攻吳聯孫不理張。）但是精神的力量，竟克服了物質的缺憾，經過汀泗橋賀勝橋兩役，革命軍竟如摧枯拉朽的佔據了漢陽和漢口。武昌圍攻了一月，在十五年雙十節那天進了城。當時總政治部在漢口的小同志，精神奮發，分乘着汽車赴漢口市各地去發傳單。我也很高興的坐着一輛汽車伴着他們去宣傳。城破之後，總司令行營，便搬進了武昌的「督署」。我奉命爲行營秘書，襄助行營主任鄧演達。叱咤風雲，睥睨一世

的吳大帥，竟這樣輕易的打倒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武漢陡然產生了許多新貴，同時另一面，當然又產生了大批失意的政客和官僚。不久，九江南昌，相繼佔領了。武漢形勢，越加鞏固，而孫傳芳却敗走南京城。從十五年秋，到十六年秋，不僅長江方面，革命勢力日益發展，因為馮玉祥師出潼關，革命軍攻出武勝關，以及奉軍南下與革命軍對壘，整個北方的局勢，也發生極大的動搖和變化；就是本黨的內部也發生了極大的分化。隨着革命勢力的發展，國共的磨擦，黨內的糾紛，也同時激盪的發展而尖銳化。

當時我奉命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校長是蔣先生。鄧演達代理校長，張文白（治中）爲教育長。鄧的兼職很多，張也兼學兵團團長，另外在南湖訓練三四千人。所以學校的事，大半由我主持。當時最痛苦的，就是應付國共的磨擦。我已於十三年冬在廣州脫離了共產黨，所以共

產黨對我，自然是對立的。同時國民黨的右派，却認我仍然帶有紅色，時加以監視和牽制。當時工兵隊和礮兵隊的學生，是從黃埔調來的，步兵學生二千餘人，則是在武漢新招的。我是學生招齊了之後，纔被調到學校，所以新招的學生，三分之二是共產份子。十六年一月蔣先生由南昌到漢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學生份子複雜的情形報告他，他要我切實的監視。記得當晚去訪的，還有當時被共產黨壓得氣都透不出來的葉楚傖。他也是秘密的去談國共的問題的。

革命勢力既已發展，國民政府當然不能蹙居廣州一隅，而要遷移了。當時本決定遷移武漢，而蔣先生因為武漢幾全為共產黨所支配，而且唐生智也另有打算，所以主張暫遷南昌。爲了這個問題，不單是國共之間，爭鬥激烈，黨的內部，也非常糾紛。結果，還是遷到武漢。蔣在武漢不過幾天，就



回南昌，準備攻略南京。當時共黨對我和文白，更加嚴密監視。蔣於南昌出發之前，曾三電文白，叫他帶着學兵團赴安慶待命，作爲總預備隊。三電沒有得覆，遂打電來問我。我去詢文白，纔知道當時文白的往來電報都被扣留了。我遂回了一電，究竟接得與否，以後也沒有去查。但是因此共黨對我監視越加厲害，請鄧演達派了有名的共黨譚代英來做總政治教官，實際上執行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文白隨着被迫辭去學兵團長及分校教育長的職務了。那時我們都有離開武漢的決心了。有一晚在漢口的一個小旅館和文白密談，他決定先去，並送我三百元，作爲緊急時的旅費，當時的三百元，值得現在的三萬。所以他的盛情，我至今不忘，文白去後，我時時準備逃走，但是因爲妻兒都在武漢，而輪船碼頭上共產黨的工人糾察隊，稽查更加嚴密，我如被發現逃走，不待說是處死刑。因爲當時的糾察隊，是可以隨便殺人的。

在這個時候，革命軍佔據了上海、南京，不僅孫傳芳打得棄甲曳兵而走，張宗昌的援軍，也如秋風掃落葉似的，趕回山東去了。於是國民革命軍遂奠定了長江流域。

南京克復之後不久，就是十六年四月，南京又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和武漢的國民政府，遙相對峙。

我那時在武漢脫身不得，正在百計圖逃的時候，四月下旬，忽然夏斗寅的軍隊，舉起反共的旗幟，由宜昌東下，直追武昌。那時第四第八等主要的軍隊，已開往河南，武昌沒有有力的軍隊，足以抵抗夏軍，於是把我們學校幾千學生，編為一個獨立師，開出去打仗。當時如果要我一同出發，那就會永久不能脫身。僥倖他們不要我去，譚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的名義，隨軍出發，我仍留校留守。那時因夏軍逼近，共產黨也深為恐慌，以全力集中去

應付，稽查得沒有那種嚴密了。我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在漢口法租界開一個小旅館，妻兒以看戲洗澡爲名，住在旅館，好在沒有甚麼貴重物品，不過幾件隨身衣服，也很容易陸續運過江，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老友陶希聖忽來談；我便告他我要走了，並勸他也走。他說隨身只是軍裝，沒有便服，不易逃脫。我太太淑慧，就把我的長衫短襖送了他一套。誰知以後他竟沒有走，竟做了學生改編而成的獨立師的軍法處長，被逼殺了不少的國民黨同志。以後武漢分共的時候，還隨着這個隊伍跑到南昌。一直到葉挺賀龍等共產黨在南昌暴動的時候，纔能脫身。可見遇緊急關頭，如果不當機立斷，沒有不貽誤的。不過他沒有把我要走的話去告密，這還算是夠朋友的。這些閑話，不必多提。

那時我岳父也在漢口，他認識太古洋行黃浦輪船的買辦，和這位買辦商

量好，在清晨六時左右，由他接我上船，住在買辦房中，以後妻兒陸續也上了船。一上了船，我便安心了。因為那時漢口英租界雖然收回，英帝國主義，仍有餘威，共產黨無論如何猖獗，還不致上船搜查。於是就如此這般的於五月初間離開了漢口。以後聽見說，他們發現我逃脫，立即電九江軍警截留。幸而這隻船在九江沒有靠岸，就此脫出虎口了。

誰知跳出了天羅，却跌入了地網！世事固然變化莫測，但也不是無緣無故而發生的。

前面曾略提過，黨內的右派，還以為我帶有紅色，所以我也特別小心，打算先到上海。到上海後，電蔣先生及張文白戴季陶等朋友，然後再到南京，所以船經南京，並未上岸。以後船到鎮江略停即開。船開後，買辦神色倉皇到房裏來說，南京派了四個偵探坐火車到鎮江，上了這隻船，說明我在

這船上，到了上海，便要逮捕。我深覺事情離奇，百思不得其解，以後纔知道我偶爾到甲板散步，被幾個同樣由武漢逃出的政治工作同志看見了。他們認爲我是共產黨，在南京上岸，立即去報告當時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陳真如（銘樞）。（主任是吳稚暉，不管事的。）陳便派人跟踪，並電上海逮捕。這些話都是以後他自己告訴我的。當時便同岳父和淑慧還有幾個同行朋友商量，決定到滬我先上岸，立即分電各方，他們隨後搬運行李。到了楊樹浦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岳父送我上岸，叫了一部汽車，看着開車了，他以爲無事，便回船去帶領我的妻兒上岸。誰知車開不到三分鐘，忽來了大批巡捕，把車阻住。有人拿電筒把我一照，就叫我下車，一付手鐐，立即銬上了我的雙手。我心裏想：『真的被捕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離奇滑稽。奉命來捕我的，便是現任內政部長陳

人鶴（羣）同志。我在人羣中看見了他，便很高興的高呼：『人鶴！我來了。』他那時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或者以爲我真是共產黨，所以便假裝沒有聽見走開了。他當時的地位，除此別無他法，也難怪他。我當時便想如何能通一個消息與淑慧；恰巧同行的二個留日同學經過身傍，我使用日語告訴他，我被捕了，要他通知淑慧，不久我便和其他五人一併帶到巡捕房。後來聽說當時立即要把我引渡到豐林橋的特務處去，却因爲那時已是星期六晚上，第二天又是星期，所以我便在巡捕房關了四天。僥倖有這四天的餘裕，淑慧纔能向各方奔走營救。如果早一兩天渡引過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爲那時殺個把人那裏算一回事。

當晚五個人被送進一間牢獄去，中間已睡了十二三個人，都是蓬頭垢面的，一個個像是惡魔。我當時疲倦萬分，在人縫中擇一個隙地，納頭便睡。

次晨星期日，把我們數人帶到另一空房。這一天昏沉沉的過去了，顆粒未曾入口。在那種情形之下，就是甚麼珍饈美味也都不能吃下去，何況是不能下嚥的牢飯！星期一中午時分，有人在門外叫我的名字，我從鐵門上小小的洞口看出去，原來淑慧站在門口。這個時候，我不禁潸然淚下。原來淑慧接得消息後，急得要死，半晌不省人事。後來精神略定，便去找文白，湊巧他赴杭，遂託其家電杭報告，再去找季陶，而季陶又在南京。當時上海傳說共產黨捉到就殺，淑慧不知我當晚究竟在那裏，一定要查明我的所在地。虧她忽然想起老友郭復初（泰祺）。他那時做着上海特派交涉員。她於是到他原寓去找，却已遷居。深夜一時許坐車到豐林橋交涉使署，纔探到新的地址。再找到新的寓址，復初夫婦，剛剛跳舞回家，適王雪艇（世杰）亦在座。於是他們立即電話吳稚暉先生，請他即械楊嘯天（虎）——時做特務處長——營

救。但是我究竟在那裏，當晚終未能查出。星期日費了一天的工夫，纔查出我關在楊樹浦巡捕房。所以星期一特來探監，送一些吃的東西。她告訴我報上已登出我被捕的消息，各方面都已打電報去了，勸我放心。我也安慰了她幾句，斷腸人慰斷腸人，談話不到十五分鐘，便被無情的牢子硬叫她出去了。但是我却因為她的一次探監，精神上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也就安心靜候了。星期二上午坐着囚犯的車子，被帶到第一特區法院出堂，法官倒也客氣，問了幾句，便令回押。淑慧運動就在法院保釋，當時院長是廣東大學同事盧興原，也很幫忙。但是終於星期四被引渡到豐林橋特務處了。

特務處借着一間洋房做臨時牢獄，我進去時中間已有十餘人。這裏的牢飯，比巡捕房的好得多。不過在巡捕房不要銬手鐐，此地却要銬。而且大概因為手鐐不夠的原故，兩個人銬一付。大小便時，固然極不方便，因為一個



人大解的時候，一個不要大解的人，硬逼得要立在傍邊等，就是吃飯睡覺的時候，也極不方便。大約兩天之後，文白跑來看我，看見鐵索瑯瑯的情形，便上樓和楊嘯天大吵一頓，於是我的手鐐，便因此除下了。雙手自由之後，多了一件差使，就是吃飯的時候，爲被銬手不自由的同伴盛飯。坐在內裏的心理，有時希望外面叫我出去，有時却又怕被叫。因爲同房被叫出去的人，有些雖然仍舊回來，背上却被打得皮破血流。有些一出去就不回來了。這些人中，有些是被釋回家，有些却被迫送到老家。所以又想被叫，又怕被叫。大約三天之後，門外真的叫出我的名字了。禍福不可知，吉凶難預料，祇得硬着頭皮出去。却原來是審問。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做法官坐在上面，我因爲眼鏡被取去，近視眼看不清楚，面孔好像認得。他開口便說：『在廣州我常聽你講演，現在你却要受我審問了。』我聽見了這樣揶揄的腔調，真是無名火

高三千丈，幾乎要罵出來。立即便想到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雖然是毛頭小子，我現在却是階下囚。於是便『他問一句來我答一聲』。約莫二十分鐘左右，忽然有人送一個條子給法官看。他看了便說：『現在不審了，你太太來看你，你去會她罷！』原來淑慧正在這個時候，要郭復初陪着她見楊嘯天，要求見我。嘯天無法，遂下條停止審問，並要我上樓和淑慧見面。淑慧告訴我當晚赴南京託季陶，因為當時蔣赴徐州作戰，南京上海主張殺我的人很多，陳真如不敢負責釋放。當時是沒有錢買臥鋪的，可憐淑慧晚上坐着三等車來往了幾次，而且有時沒有坐位，竟站立幾個鐘頭。

這樣糊糊塗塗，在牢裏再住了大約兩個星期。同住十餘人，也不知誰是真的共產黨，誰是假的。因為同住一起，也不管並不問誰是真的，誰是假的。閑着無事，跟同關着的一個人學唱二本虹霓關『見此情不由人心中暗

想』那段二六。有一天下午六時左右，外面又叫起我的名字來了。我想一定是前回審我那個小傢伙，闲着無事，又要拿我尋開心。誰知外面叫了我的名字之後，接着說：『把你的衣服帶出來！』我聽了這句話，知道是釋放了。對同住的人，拱手說一聲：『告辭了！』便拿着包裹出來了。出來之後，看見一個副官模樣的軍官，帶着四個帶駁殼槍的兵士，把我的雙手，又鎖銬起來。帶我出了大門，門前早有一部汽車等着。上了汽車，往鄉間直開。越走越荒涼，而且又已夕陽西下。我想來想去，不知到那裏去。釋放嗎？何以不叫我家裏人領去？何以又要銬手？鎗斃嗎？何以叫把衣服帶出來？難道真的因為『黃泉無客店』，怕我受寒冷嗎？問那位副官，只回答說：『等歇你會曉得。』後來到了南站，纔知道是押解我赴南京。次晨到了南京，巡送我到戶部街當時的總政治部。當時時間還早，陳真如沒有來，便押在門房候着。

不久來了一位副官，叫把手鏡開了，帶我上樓。真如一見，便笑容滿面握手說：『對不起，開了你一個玩笑。』談了半天，便說：『今天還在我這裏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出去看朋友罷。』於是便叫副官送我到一間房間。當時蔣先生尙在徐州，大約是打電去請示。第二天便把我送到鐵湯池丁公館，交給季陶。鐵湯池丁公館，便是現在的財政部。這也是當時夢想不到的事。和季陶共進了午飯之後，便去旅館訪文白。適淑慧也趕到。夫妻重圓，不禁悲喜交集。這是我生死關頭，所以這一段特別寫得詳細。

蔣先生回京的時候，我去見他。他關頭便問我爲甚麼不在南京上岸，惹出這些麻煩。當時南京籌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文白被派爲政治部主任，我又被派爲政治總教官。這個時候稍閑，便開始著述『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

十六年六七月以後，武漢的國民政府，發生了變化，南京國民政府，也發生了暗潮。就是武漢也開始反共，把持一切的鮑羅庭，被送回俄了。這樣的劇變，決不是兩三個月以前所能夢想的。南京則蔣與桂系之間也發生了極激烈的暗潮。當時廣西第七軍，好像是駐在蚌埠一帶。蔣因為環境所逼，遂不得不於八月下野了。這樣突如其來，天翻地覆的激變，真令人震動異常。一個連戰連捷的革命軍主帥，在餘敵尙圖掙扎，內部阨陞不寧的時候，忽然棄職下野，革命軍的前途，真要發生整個的動搖。

在這個驚濤駭浪之中，我當然也跟着到了上海。這一次不能不說是一幕政治上極急激，極劇烈的變動。

當時季陶已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校長，電我赴粵襄助，我於是又到了廣州。這時正是葉挺率着共產軍在南昌暴動後，率部直趨廣州。我到粵不到兩

月，看見形勢岌岌可危，便和季陶回滬過陰曆年。我們離粵不久，共產軍便攻入廣州，焚燒屠殺了一場。

回滬之後，知道蔣先生要在上海辦一個刊物，指定季陶、力子、果夫、布雷和我五人爲委員，並指定我負總責。我們決定名『新生命月刊』。於是風靡一時的新生命月刊，便於十七年一月產生了。（新生命月刊發刊辭係季陶所寫。）

我在上海辦理新生命月刊的時候，南京的局面，是白崇禧和何應欽支持的。桂系和唐生智之間，此時發生了磨擦，桂軍西征，把唐趕走了。唐生智崩潰得這樣快，真出人意料之外。因爲何鍵當時做安徽主席，安徽也是唐的地盤。兵敗如山倒，這句話真有道理。於是武漢便成爲桂系的地盤。因此十六年九月，武漢的國民政府搬到南京，和南京的國民政府合併統一了。

蔣先生由日本返國，於十七年一月東山再起，復任總司令，削了何敬之的兵權，調爲總參謀長，把國民革命軍，編爲四個集團，自任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而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這樣重整陣容，繼續北伐。李白佔據武漢的地盤，另組武漢政治分會，而以程潛爲主席。但是不久程又被李白軟禁去職了。這是後話。

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又奉派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復理舊業。當時新生命月刊，發展極快，極受各方的歡迎，和當時公博所辦的『革命評論』，並駕齊驅。雖然我們只談理論，『革命評論』兼談實際問題，但是都可以支配並指導當時青年的思想。同時顧孟餘也在上海辦了一種雜誌，名『前進』，却是無聲無臭，毫無影響。當時我又辦了一個新生命書店，出版許多叢書。我的『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三個月之中，銷售了四萬餘

冊。在上海正幹得起勁，真想不到南京去重彈舊調。以後因爲命令既不可違，友朋又復相勸，所以把新生命月刊，帶到南京來編，重復穿起軍服，掛起皮帶，去過半軍人半文人的生活。

我因爲在學校工作，所以沒有隨軍出發。國民革命軍四個集團，同時並進，孫傳芳張宗昌的殘部不必說，奉軍的主力也擊退了，張作霖出關回奉而被炸了。於是各軍的革命軍，就會師於北京，而北伐因以告成。

七月份蔣先生要到北京去，文人之中指定力子、布雷、立夫和我隨行，在身邊幫忙。另外張岳軍（羣）和楊暢卿（永泰）先往，暗中策劃。一行浩浩蕩蕩，受着沿途迎送，先到保定，和白崇禧等前方各路總指揮先行見面，再到北京。我們都隨節駐西山碧雲寺。當時國父靈寢，仍在西山，遂舉行祭靈大典，報告北伐完成。記得讀祭文的，是當時第三集團軍之下的總指揮



商震，一口北京口音，聲調抑揚，很能動人。當時不僅四個集團軍總司令，就是各路總指揮，也都齊集北京。濟濟一堂，真是極一時之盛。大家興致之高，意氣之豪，真是不可一世。當時東北易幟，接洽將成，從此化干戈爲玉帛，易割據爲統一，中國前途，真有無窮的希望和光明。我當時雖然是一個跑龍套的角色，但是親歷其境，這個盛況，畢生不忘。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萬感交集！

當時集議之下，定了編遣計劃，接着召集編遣委員會，誰知以後的反覆內戰，却由這個編遣計劃而種下了惡因。這是後話，不必去說。

隨節回京以後，因爲種種關係，仍想去上海專辦宣傳文化工作，託果夫屢爲婉言，好容易得了許可。於是於十月辭去軍校職務，回到上海。在這個時期之內，武漢和南京的關係，日漸惡化，暗潮漸漸高漲，終於澎湃爲不可

遏止的戰潮了。

彷彿是十八年的二月間，蔣先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他說：『你還是到南京去幫忙，就去。』到了南京，要我搬進總司令部，於是就住在力子隔壁的房間，就是現在三元巷警官學校的前樓。前年兼任警政部長，到警官學校去視察的時候，在這個房中徘徊許久，感慨橫生。這時正在召集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滑稽得很，我被指派爲菲律賓的黨員代表。那時也不知道是因爲甚麼原因，大部青年同志，對胡漢民先生感情都不甚好。在開會的時候，大鬧一場，我和段錫朋、洪陸東、蕭鋒、何思源等十餘人，當場退席，再不出席了。以後纔知道這次我若不退席，可以當選爲中委，因爲名單早已秘密擬好了。當時胡先生還疑心是蔣先生，至少，是果夫叫我們幹的，和他爲難。其實這是冤枉，完全是我們十幾個青年同志自動幹的。因爲當時蔣久

生對武漢將有所舉動，要運用代表大會授權給他，處理緊急事變。

有天晚上，蔣先生親自打電話給我說：『請你馬上到公館來一下。』那時的公館就在總司令部之後，內裏是可通的。他叫我草擬一篇討伐李白的宣言，並口授李白種種背信和不法的事實和要加以討伐的理由。我心裏暗想，真的要幹起來了。

前方已接觸起來了，約是十八年三月，我奉命隨同出發，隨節坐着楚有軍艦上駛。當時有兩個幕後人物，文的仍是楊暢卿，武的便是廣西軍人前輩俞作柏。他們另外坐一隻被徵發的招商局的船隨後跟上。因為運用俞作柏的關係，桂軍裏面最有力的兩個師長李明瑞和楊騰輝，早已和中央發生了關係。等到中央軍進了湖北境，桂軍這兩部有力部隊，忽然宣佈擁護中央，李白自然不能退出武漢了。彷彿我們出發以後不到一個月，桂系在武漢的勢

力便崩潰了。楚有軍艦停泊在漢口下游五十餘里的江中，看見上面駛來一隻小火輪，原來是民衆團體的代表來歡迎。我代表接見，並發表簡單的談話。於是楚有軍艦，便逕駛到漢口。這次桂系崩潰得這樣快，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就解決了武漢問題，也是出人意料之外。

到漢口不久，便奉命爲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兼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於是又穿起軍衣，掛起皮帶了。

舊地重遊，回想十六年脫出武漢的情形，真有隔世之感。自從我離開武漢之後，武漢的局面，經過了好幾次的大變化。由共產黨猖獗，演變成武漢清共，由清共而變成唐生智獨裁。唐生智崩潰，繼之以桂系當權。現在又變一個局面了。在這短短的兩年之中，在這小小的區域之內，就發生這許多次人事升沉，派系盛衰的現象。政潮的起伏，個人的得失，那裏能夠預料，那

裏可以認真！

兩湖奠定之後，便隨節回了南京。正在這時前後，第二幕的活劇，又將醞釀成功了。

蔣馮之間，隔膜日甚一日，暗潮也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五月以後，愈加決裂。看見兩人來往電報，打筆墨官司，就知道不久也要兵戎相見了。雙方都調兵遣將，劍拔弩張，準備大戰。但是馮以退爲進，表面上，於五月底通電下野，以閻之邀約，赴山西晉祠；閻同時也請陪馮出洋。這不知玩的是甚麼把戲，大約是消極抵制。因此蔣於八月再到北京一次，這次我也同行，同住北京飯店。閻來北京會談，蔣勸閻不必出洋，但馮則必須出洋。閻因之稱病入德國醫院，謝絕見客。我們住一個多禮拜，便回南京。

蔣先生手法真巧妙，早已和馮有力部隊韓復榘、石友三有了接洽，韓石

忽於此時通電擁護中央。同時起用了唐生智，叫他到天津集合因北伐留在京津一帶的湘軍，進駐鄭州。十月十日，西北將領通電討蔣，第一次蔣馮戰爭從此開幕了。

在武人磨槍擦刀的時候，我們拿筆桿的同志，就忙着草擬通電、宣言和宣傳大綱。唐生智以前敵總指揮的名義，指揮隊伍，在黑石關和登封、臨汝一帶和馮軍開火之後，我於十一月初又奉命隨節出發了。先坐船到漢口，再乘車到許昌。總司令部，即設在火車上。唐生智當然到許昌來了。兩年多不見，他已是升而沉，由沉復升，翻了幾個筋斗了。當時韓復榘、石友三、何雪竹（成濬）等，都集合許昌。會商後，唐便出發到黑石關去督師了。經過了幾次激戰，馮軍節節敗退，戰局已具有了決定性，不難結束。而其他方面的複雜變化，却非到南京去處理和應付不可，所以唐生智便奉命代行總司令

職權，全權處理前方事務，於是我們又隨節返京。這次到許昌，不過一月，前後計算，軍事行動，也不過約略兩個月，這場糾紛，就告結束，不能不說解決得快了。

不圖霹靂一聲，由天外飛來，於我們回京後不久。代行總司令職權的唐生智，在鄭州宣佈脫離中央而獨立了。當時我們實在奇怪。唐要這樣幹，爲甚麼不在馮軍未敗之前和馮軍聯絡起來幹呢？何以在馮軍既敗之後，中央應付裕如的時候，有此異動呢？何不再等適當時機纔幹呢？大約他因爲武漢空虛，所以想領兵直窺武漢，恢復他民國十六年武漢的局面。那知道被阻於漯河，於大雪之下，幾日激戰，他仍不能不離開軍隊，再去作寓公了。於是突然而起的高潮，又突然消滅下去。變幻莫測，何勝感慨。

當唐在鄭州異動的時候，在鄭州的中央機關和要人還很多，事前一無所

聞。每晚和唐一起打麻將的朋友，也一些不知。當時經理署長俞樵峯（飛鵬）也在鄭州，唐看着打麻將的情分，沒有綁財神，請他安全的離開。鐵甲車司令蕪素心（鋤歐）因為是湖南人，被唐硬扣留幫忙。以後素心告訴我，當漯河戰敗之後，唐進退兩難。有天無聊，和素心等拆字，以決吉凶。當時擇了一個『道』字，於是唐決心逃走。因為『道』字，暗示『首領要走了』這也是政局動盪中的一個逸話。

同樣的時候——恕我記憶力不佳，時間不能正確記憶——兩廣的形勢很不穩，陳真如的軍隊，不夠鎮壓。因此派和陳很要好的朱一民（紹良）統率湘軍毛炳文部和石友三的一大部，由海道赴粵增援。石部集中浦口待船。有晚深夜，我接着憲兵司令谷紀常（正倫）的電話，說石部在浦口叛變了。（好像這個時候，唐生智還沒逃走，河南正在打仗。）大家都以為石部一定



渡江，占據南京。因爲一方面以爲唐石已有聯絡，一方面那時南京只有一團多憲兵和軍校幾千學生，空虛極了。當晚南京大爲震動。誰知石唐竟沒有具體的聯絡和計劃，石部竟不渡江，呼嘯北去了。當唐生智異動的時候，每次給蔣的電報，自己都還稱『職』。因此，胡展堂先生有『造反猶稱職，逞兵不渡江』的兩句打油詩。

到了民國十九年，蔣閻之間的關係，又漸漸惡化起來。聯馮的時候，用了馮系的薛篤弼做內政部長。打馮聯閻的時候，就任命閻系的趙戴文爲監察院副院長，又給趙丕廉做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但是閻系的要人，雖在中央任了要職，以任蔣閻間的意志疏通和感情聯絡，但是關係的惡劣，終難免趨於白熱化。

十九年二月初，一電飛來，閻以禮讓爲國的理由，約蔣一齊下野。於是

雙方一面打筆墨官司，一面調兵遣將。消息一天緊一天，馮也離開晉祠，回到潼關去了，馮閻聯合起來倒蔣了。當時由津浦線南下的，完全是閻軍，閻親自指揮。沿平漢線南下的是馮軍，沿隴海線東進的，閻軍馮軍都有，而以閻軍爲主體，馮則駐鄭州指揮。我又奉命隨同出發，大約是十九年五月，先到濟南佈置津浦線方面的戰略，再到隴海線。總司令部當然就在車上。當時閻馮軍已趨過歸德，似乎在馬牧集，所以我們總部的專車，就停在碭山。開火以後，馮閻軍節節敗退，由歸德西撤。總部專車進至歸德，旋復進駐柳河。閻馮軍扼守蘭封，於是變成了陣地戰，綿延了好幾個月，使我們不能在柳河車站烈日炎炎之下的鋼車中消夏了。平漢線由何雪竹指揮，雙方旋進旋退，無大激戰。隴海方面，好幾次由正面舉行中央突破，但因爲閻馮軍的壕溝，又寬又深，損失很大，死傷很多，終不能進展寸步。同時濟南被閻軍

佔領了。如果乘勝直下，佔領徐州，隴海線後路截斷，我們就要回軍都不可能，所以當時情形，頗爲嚴重。我們在柳河，也很耽心。不過閻爲人持重，不敢冒險，兵力大約也不夠分配，所以沒有推進。正在這個時候，蔣光鼐、蔡廷楷的軍隊，由廣州調到津浦路反攻。李韞珩帶着一萬左右的湖南軍隊，由海道至青島登陸，沿膠濟路向濟南反攻。我記得李韞珩到柳河請訓的時候，愁眉苦臉的到我車廂中說：『湖南兵士都沒有坐過海船，山東地形又不熟，此行真是沒有把握。』李雖是行伍出身，却是一員勇將，以後也建了少戰功。

津浦線反攻，節節勝利，不久，濟南又收復了。但是隴海線仍是曠日持久，我們總部的車子，只是停留於柳河或歸德之間。有時雖也開到野雞崗和民權縣的最前線去督戰，但是不過幾個鐘頭，仍開回原地。

我和力子隨節住在車上，陳雪暄（調元）和顧墨三（祝同）兩個人的司令部，都在柳河車站附近的小村莊。車上熱得不可耐的時候，便去他們的村莊『避暑』。每天晚上，必定去的。我不會打麻將，便和不打牌的將領，上下古今的談個不休。照這樣，一個夏天也就混過去了。這個時候，有一段事情，不能不寫。當我們住在歸德的時候，有天晚上，我從夢中被槍聲和很大的轟炸聲所驚醒。只聽見侍衛長王世和大呼道：『火車頭呢！』因為不預備開動，所以火車頭離開了列車，當時火車欲開不得。槍聲響了半小時始息。後悉是馮的騎兵，就是現任陸軍部次長鄭大章同志所指揮的，來襲飛機場，他們的任務，燒了飛機就回。誰知那時我們車上只有兩百多衛兵，車站上又沒有其他軍隊。如果騎兵達到車站，主帥以下都要被俘。那末，那個時候以後的歷史，又是另外一個寫法。真是氣數。不過那個時候，我們都學空城計

的孔明，齊說一聲：『好險哪！』

在停頓在柳河的幾個月內，政治和軍事兩方面，都積極進行着很大的計劃。政治方面，就是張岳軍和吳鐵城奉命到奉天，勸張漢卿領兵進關。閻老西的代表，當然也在瀋陽。但是老閻捨不得用錢，而這邊却是揮金如土。以後小張果然領兵進關了。雖然不完全是化錢的結果，但是錢用得多，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軍事方面，因為正面攻擊，中央突破，既不能成功，就不能不採取迂迴戰略。這次迂迴分幾路，而且規模很大。遠的一路竟迂迴到平漢路以西，去截斷鄭州以西的隴海路。軍事上各路迂迴部隊開始動作，且順利進行；政治上張漢卿於九月二十左右，發表通電，主張罷兵，一切靜候中央置措，同時部隊也向關內移動。因此，隴海正面的馮閻軍很快的撤退了。我聽見了這個消息，興奮得很，等不及隨總部列車前進，先和陳雪暄坐汽車

進了蘭封城。沿途時常聽見對方所埋地雷的爆炸聲，僥倖我們的汽車，沒有碰着。在蘭封縣公署住了一晚，第二天總部列車到了。我回到列車，隨節進駐開封。到了開封，洗澡吃館子，高興極了。兵敗如山倒，我們於十月初旬，到達鄭州。馮部梁冠英等親來鄭州，歸順中央。中原大戰，於此告終。

當時賀貴嚴（耀組）做徐州行營主任。他由京坐一列專車來鄭。他的太太和淑慧，坐着他的專車來鄭遊玩。此時蔣先生已飛回南京參加雙十節。我便搬到貴嚴的專車上，四個人一路歡天喜地的談笑到京，久戍回家，倒也開心。

在我們停滯於柳河的時期內，有兩事須要記述。第一就是共產黨乘着後方空虛，攻入長沙，襲脅而去，到贛南設立了根據地。以後傾全國之師，費時三四年，還不能完全消滅，只是驅逐到西北，演成現在這樣的蔓延和猖

厥，都是那次中原大戰造成的。第二就是蔣胡之間，又發生了磨擦和衝突。原來蔣主張戰事結束，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胡則反對。南京與柳河之間，電報往還，早已辯論好幾次。而蔣仍於十月初電請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頒佈訓政時期約法。

返京之後，又因為張學良任副司令及張系人員來中央任職的問題，蔣胡意見，更形決裂。大約十二月初旬，蔣赴廬山，我也隨去。蔣在廬山對人發牢騷：『不願回南京，離南京越遠越好，想到西北去。』在這幾句簡單的話語之中，可見得蔣胡感情之惡劣了。但他在廬山考慮的結果，決定了去胡的大計，所以不到三個星期，便仍回京，我們當時，是一點都不知道他下了決心的。

到了民國二十年了。彷彿是二月底。我因事赴上海。時張岳軍任上海市

長，約我和力子到一家酒館吃飯。他問我們道：『南京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們知道了嗎？』我們都很吃驚的齊聲答道：『不知道，甚麼事？』他說：『我也是剛纔曉得，胡先生被扣留了。』我和力子都吃一驚。這也不是一件小事。胡先生性燥，我們怕他自殺。至於西南，因為這個問題，必有所舉動，乃是我們意料中之事。西北的活劇，方才演完，西南的舞台又要開幕了。果然在五月間南京召開國民會議的時候，廣州召開了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對蔣聲罪致討了。

國民會議散會後，因為江西的共匪猖獗，所以不能不先行勦匪，至對西南問題，則明弛暗張。此次我仍奉命出發。熊天翼（式輝）做行營參謀長。在南京開了幾次幕僚會議，籌備一切，好像在五月底就出發赴南昌。從此由國民黨內部的戰爭，變成國共之間的戰爭了。回想起來，真是傷心。假使十



七年七月西山祭靈之後，大家都一心一德，埋頭於善後和建設，那裏會有十八年春的武漢和十八年冬的河南之役？那裏更會有十九年大規模的中原會戰。這次會戰，損失的物力和人力之多，實在可驚！沒有迭次內戰，共黨怎樣會猖獗，而發生連年勦匪的軍事行動？沒有由長江流域勦匪，發展成西北勦匪，那裏會有西安事變？沒有西安事變，國家焉能到今日這樣支離破碎的局面？乃竟陰錯陽差的一幕一幕演變起來！氣數耶？國運耶？人爲之不感耶？嗚呼！

南昌行營，設在百花洲的省立圖書館。我便在百花洲畔，找一個臨湖的平房寓居起來，並約以後曾經煊赫一時的楊暢卿住在我寓。雖然說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是軍事仍是主要力量。步步爲營的堡壘政策佈置完畢，開始包圍的同時，一面仍策劃對西南的問題。七月間暢卿奉命赴香港秘密工

作，對西南加以分化運動。不單派了暢卿，同時四面八方進行對西南的分化。以後畢竟運用上官雲相和余漢謀的郎舅關係，把余漢謀拉了過來。陳濟棠失去了這一部主力，也就不能不崩潰了。這是後話。

九月初蔣先生赴武漢。兩三天之後，電令我即行前往。長江好大的水！漢口全市，都變成了澤國。那時三雪——是就陳雪暄（調元）劉雪亞（鎮華）何雪竹（成濬）——都在漢口，我當時只三十四五歲，他們都和我很好，把我叫老弟，招待我在大水泛濫的漢口，痛快的玩了幾天。現在海角天涯，魚雁不通，怎麼能令人不懷舊雨而感傷呢！

我到漢口的任務，就是要我草擬討伐陳濟棠的通電和告將士書及告民衆書。我心中又暗想，對西南的軍事要發動了。

在漢口不過四五天，一直回到南京。在南京一個多禮拜，又乘軍艦赴南

昌，軍艦到了湖口，蔣改乘水上飛機先行。我們仍乘原艦，到第二天清晨纔到南昌。總部的副官來接，說：『總司令上午就坐飛機回南京，請主任今天下午，至遲明天動身回去。』我真莫名其妙了！發生了甚麼變故嗎？何以這樣急呢？跑到總部一問，却原來是瀋陽事變發生！我因為雜務待理，等第三天纔和何敬之（應欽）陳真如（銘樞）——陳是來奔走寧粵和平的——同乘飛機返京。

以後接着發生的，就是胡先生恢復自由，寧粵在滬開和平談判，京滬粵三地同時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蔣先生二次下野，孫哲生陳真如主持南京軍政等極繁重、極複雜、極變幻的各幕。

關於第四次代表大會一問題，京、粵、滬各有主張，意見糾紛複雜，議論了許久，沒有很好的辦法。結果乃是舊中委連任，增加中委名額，京、

粵、滬同時分別選舉。我在京得票最多，佔出席代表百分之九十，當選爲第一名中央執行委員。如果舊中委不連任，也要重新選舉，我絕對不會當選第一的。當時朋儕戲呼我爲狀元中委。第四屆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時候，因爲京、滬、粵三方都要把落選的人加進幾位做中委，於是以全體會議的決議，把三方落選而票數較多的，各補了幾名做候補中委。王陸一時作監察院簡任待選秘書，也因此做了候補中委。因自撰一聯云：『豈有秘書稱簡任，居然中委出恩科。』時稱爲『恩科中委』。

第四次代表大會閉會後，蔣先生於十二月第二次下野了。下野之前，都有佈置，發表幾個省政府主席，顧墨三任江蘇，我以後也被派爲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了，這乃是徇墨三的請求。蔣先生原意，仍要我在身邊幫忙，因爲墨三以軍人而任封疆，沒有把握，要我幫忙，所以蔣先生也只得徇

其請求了。

二十一年一月，上海事件發生以後，蔣先生又出山了。這次新設了軍事委員會，自任委員長。接着國民政府遷都洛陽，在洛陽召開了國難會議。在寒風凜冽之中，乘着專車赴洛陽出席會議。洛陽是中國歷史上是有名的地方，我還是初次瞻仰，但是黃沙白草，滿目荒涼，懷古之情不禁悠然而生。

汪先生已於此時出任行政院院長了。此後數年之間，我因為出任地方行政工作，除出席中常會及中政會外，不多預聞中樞的事情，以後雖兼任中央民衆訓練部部长，乃是局部事務。除參加秘密組織之外，對於黨國大計，沒有預聞，所親身經歷的事不多，不過耳聞目覩罷了。其實這幾年內，除勦匪外，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人民政府的喜劇，短時期內便解決了；廣西問題，時張時弛，但終未以兵戎相見，所以也沒可以述的。

我要特別詳述的，就是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汪先生在中央黨部被刺時，我所經歷的情形。

在大禮堂舉行了全會開幕典禮之後，便齊集到中央會議廳大門前去拍照。我站在汪先生左側後面第二或第三排。當時新聞記者非常之多，秩序混亂極了。記得照相的說：『各位預備，要照了。』這時不知道是誰說：『蔣先生還沒有來。』隨着吳鐵城大聲道：『蔣先生不來照。』照畢之後，大家轉身拾級而上。我行了兩三步後，忽聞背後鎗聲一響。聲音甚小，以為是放爆竹慶祝。但是接着鎗聲又起，形勢大亂。我回頭一看，只見一個穿灰色大衣的人，拿着槍向人羣中轟擊。於是大家向鐵柵門內急跑。我看見朱驢先（家驊）在我面前向地伏下。我也隨着他伏身而臥。剎那間，忽想這不是辦法，仍立起奔進鐵柵門，站在門內牆角隱身。這個時候，人聲嘈雜，槍聲大

起，說時遲，那時快，忽見一人倒在我的面前，滿臉是血。當時驚魂未定，也沒有去細看是誰。後來鐵柵關了，槍聲止了。忽聽見有人說，汪先生受傷了。我仔細一看，原來倒在地下的，乃是汪先生，已經身中數槍了。事起倉卒，變生肘腋，所以那時震動、驚惶、懷疑等情緒，不僅充滿了我的心，且支配了全場的空氣。同時一面接醫生，一面查緝凶手的餘黨，混亂、忙迫，而且緊張萬分。好容易醫生來了，把汪先生護送到醫院，這纔開會。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情形，我畢生不能忘記。

現在再一述在南京所經歷西安事變所反映的情形。我當時仍兼民衆訓練部長，那天，在中央大學指導一個民衆集會。下午七時方回家。淑慧告訴說：『各方面打來了十幾個電話找你，蔣先生在華清池被張學良的亂兵包圍了。』這個消息真是青天霹靂，使我震動。當天晚上，中央黨部召集緊急會

議。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趕快查明下落。究竟是生是死，毫無正確的消息。第二是如何處置。關於這個問題，分爲兩種意見。戴季陶何敬之等主張採取嚴正的態度，要爲國家立紀綱。孔祥熙等則遵從宋美齡的意見，主張緩和。關於辦法，有主張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一幕是共產黨主使的，不進去對共產黨說話，但是要去找蘇聯。意見紛紜，議論複雜。直至夜深，沒有辦法。但是對於緩和論者的主張，大家都不便反對。我回家之後，心想中國真是多災多難。共產黨流竄西北，正要消滅的時候，忽然發生這樣的變故。此次一定是凶多吉少。小張既然下了這個決心，必定有個遠大計劃。即使不立即加以殺害，至少決不會馬上恢復自由。所以對於國家的前途，悲觀極了。

世界上的事，本來不能預知，這件事尤其使人莫明其妙。張竟親自送蔣到洛陽了。以兒戲始，以兒戲終，固然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但是這一幕兒



戲，却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沒有這一幕，那時以後的中國歷史，當然又是另外一種寫法。至今思之，猶有餘痛。

汪先生聞西安之變而回國，廿六年一月抵香港。我和力子，奉命赴香港歡迎。不久召開中委全體會議，我奉命把民衆訓練部長讓出，仍請公博擔任。不數月而蘆溝橋之變起。事變以後的經歷，等到十年以後再述，現在就在此截止了。

把過去經歷的事，一一回想起來，好像白髮宮人，談開元天寶遺事，只落得徒增感慨，更覺悲傷。悲歡離合成敗興亡的場面，一幕一幕的表演過去了。是真是假，亦色亦空，把跑龍套的演員，頭也跑昏了，眼也跑花了，神也跑迷了，深深的感覺浮沉於茫茫人海之中，和起落不定的政潮之內，得失升沉，都不過是曇花一現！所以夜深人靜的時候，幽居獨念，真欲跳出十丈

紅塵，避世唯恐不遠，入山唯恐不深！

但是身世之感，雖常令人發生出世之想，而家國之憂，却不能不令人鼓舞餘勇，堅定貫徹初衷的決心。尤其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正是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的時候，是非未定，功罪難分。如果半途而廢，雖存周公之心，終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對祖先，下何以對子孫！後世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遺臭萬年也好，無聲無臭，與草木同朽更好，『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但是個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計較，國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慮。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諒於當時及後世，乃在使個人的苦心、努力和犧牲，實際有益於君父。所以現在距我們企求的目的，雖然道路崎嶇，關山險阻，但是救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達到，就是我們的責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那裏能夠因為

人事滄桑之感，而改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呢！

（附記）以上所述事實，全憑記憶所及，時間容有前後倒置之處，讀者諒之。

(三)  
自反錄



## 自反錄

『人苦於不自知』，這句話我們常常聽見，足見知人固難，知己也非易事。但是一個人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那裏能夠好好的處世接物呢？我常常站在我自己以外，來批判我自己；換句話說，就是以客觀的態度來反省，看看我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平日的習慣和做事的作風，是好或是壞。今天擇其可以發表者寫出來去清償『古今』的文債。這篇短東西，是赤裸裸描寫個人的性格，既無護短之心，更沒炫長之意，不過自反而已。

我最沒有恆心。無論做甚麼事，都是或作或輟，半途而廢。除却晚上記日記，飯後睡午覺兩件事，十年如一日之外，沒有一件事能夠繼續長久的。

平日也學了一些修養的功夫，衛生的方法；平日也定了一些讀書的計劃，處事的程序，但是都是一曝十寒。所以弄到年將半百，一事無成。道德文章，學問事業，一無成就。這都是無恆的結果。這個毛病如不痛自針砭，將來一定是與草木同朽，那裏能爲天下國家，負擔責任！

我是一個率真的人。這一點，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認識，喜怒不現於詞色，我是絕對做不到的。三句話不投機便面紅耳赤的爭起來。要想說甚麼就說，不知隱藏，不知顧忌。要我說假話，是萬不可能的。因此做起事來也是走直線。轉灣抹角的走曲線，不單是我自己做不到，而且和這類的人談話或共事，真要我的命。但是這究竟好不好呢？民國十七年戴季陶先生撰書一付對聯送我道：『困學乃足成仁，率真未必盡善。』這真是對症下藥，針砭我的知己之言。因爲我無恆，所以季陶要我『困學』。至於率真，他老實說未

必盡善。影佐少將會和我論做事的方法。他說：『做事不可用詐略，但不妨用謀略。』這也是勸我做事不要過於率真，不要太走直線。這些好朋友對我的規勸，於我是非常有益的。

我的記憶力很不好。在學生時代，曾用了七八年的苦功，想成一個學者。但是最後，我自己因為絕望而放棄了這個野心。因為『博聞』之後，要『強記』纔行。博聞而不能強記，任憑讀了多少書，有甚麼用處？但是說起來也奇怪，我做起來，却比較有記憶力。很小的事情，當然也常常忘記，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我却一件沒有忘過。現在我每天頭腦中不知要裝多少複雜而不連貫的事，而且這些事都要去做的，但是竟沒有因為忘記而誤一件事。每每和日本朋友議事的時候，他們都拿出一本小冊隨談隨記，我却沒有記過。有一次和影佐少將商量許多要緊的事，他照例的筆記，看我仍不記，



便勸我道：『你不要仗着頭腦好，還是記下爲安。』讀書沒有記憶力，做事却有記憶力，是不是古人所說的『酒有別腸，詩有別才』的意思呢？

用人還是將將好呢？將兵好呢？這當然是看怎樣去運用。但我的性質，是完全將將的。一件事交給一個人，完全是『委任責成』，不猜疑，不牽制。委一個人做一件事，在他的左右前後派一些人去監視，在我的天性上是絕對不願做的。數年前和熊式輝論用人，我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老生常談，他却主張『用人必疑，疑人必用』的走偏鋒的辦法。他說像我的辦法，一定弄到太阿倒持，尾大不掉。我說這完全看所用的人如何，所將的將如何，如果所託非人，當然有這樣的毛病。所以『知人善任』，乃是先決的條件。我的將將的辦法，當然也上過一兩次當，但是大體是成功的。不客氣的說，對於『知人』這一點，我雖然沒有十分的本領，但是確有七八分的

自信。

我覺得弄手段，是最蠢不過的事。我聰敏，人比我更聰敏；我會弄手段，人比我更會弄。即使人家被我欺騙一次，決不會再度或二度被騙。等到一被人發覺，那便一切都完了。所以我治事待人，都是老老實實的開誠相與。會國藩大家都知道是以誠待人，以拙治事的。但是他最初却是相當的用權術；弄手段。從他的經驗中知道權術有時而窮，手段有時而盡，所以他改變作風，以誠以拙。雖然到了他的身後，還有人批評他是偽君子，這未免過於苛刻。我治事待人，一向也都本着誠拙兩字，究竟這個作風會成功或失敗，那就管不得許多了。

富於情感而面子軟，是我的長處，也是我的缺點。當面被人請託或要求，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常常利用我這一點，我也曉得因此常被利用。

我的好朋友常說我是好好先生，太『易與』了，勸我要『厲害』一點。我也常常這樣想，但是我的結論是聽其自然罷。甯人負我，毋我負人，個人吃一些虧，上一些當，也算不得甚麼，何必計較？

容易衝動，也是我最大的毛病。這也是率真的結果。常常感情用事，理智都不能克服，因此引起不少的反感和誤會。雖然居心無他，究竟不可爲訓。關於這一點，因爲常常痛自抑制，火氣比以前小得多，我的朋友，都知道，槪之默村等常常說我進步得多。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衝動的時候，仍然難免。

做事敏捷而果斷，是我的習慣。這乃是性急的結果。但是果斷的結果，易流於輕斷。一件事的利害得失，沒有考慮得非常周密，遽下判斷，遽去實行，實在不算『老練』。怎樣能使果斷不變成輕斷，怎樣能使深思熟慮不變

成遊移不決，是今後要下苦功的地方。

有相當魄力，是我自負的地方。說做就做，說幹就幹。一件事只要認為正當，而決心去做，是不論成敗，不顧毀譽，不計得失，一定要幹到底的。但是因為上述的有時容易由果斷而流為輕斷，過去也許有了不少錯誤的認識。所以對於任何一件事，正確的認識，充分的理解，和其前因後果的適當的考慮，在我是絕對的必要；否則，生吞活剝鹵莽滅裂的情形，恐不能免。

勇於負責，也是我的天性。我常常想為國家做事，為領袖服務，不僅要任勞，而且要任怨。但是自古任勞易而任怨難，我以前也曾考慮過，何必怨尤叢集，使一身成衆矢之的呢？但是我仍以爲應該做的事，應該說的話，應該不顧毀譽，不計恩怨，要負責去做去說的。不過最近也許我世故漸深，漸漸的失去這個特性了。這究竟是進步或退步，實在難說。不過我總想務必

保持我的天性，或方法學得巧妙一點，使一方面仍舊負責，一方面不招怨尤。

我性情疎懶，不好酬應敷衍。見我見不着，請我請不到，人來拜訪，我不回拜。所以許多人以為我架子大。其實我服官十五年，仍不脫書生本色。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言語行動，生活習慣，仍完全是學生派。不過無謂的應酬，我實在是不願意。但是絕對不是不合人情的孤癖高傲。因公來見的人，無一不接見的。有意義的宴會，沒有不到的。不回拜人，是我的不對。但是全因疎懶或事忙，決不是擺架子。不過因個人的請託或無聊的事來見的客，對不起，我是不感興趣的；而且也沒有這些冤枉時間。又如每天接着投効請任用的信，不知多少；對於這些信，究竟回不回，實在費了我不少的考慮。我想人家既發一信，當然有無窮的希望，每天等着回信。如不回信，不令人

失望嗎？這未免心太忍了。但是又想如何辦法而回信，人家自然喜歡，如果只是『相機設法』、『存記候用』等類敷衍的信，雖說『相機』，永遠無機，雖說『候用』，永遠不用，那不是仍叫人失望嗎？如回信說沒有辦法。也一樣的令人失望。所以我便決定：有辦法，就回信；無辦法，對不住，只好不回了。人家要罵由他罵，且爲公家省些紙張，且爲我的秘書省些時間吧。

要寫的還很多，不必再寫下去了。總而言之，我自反的結果，覺得我做人固然有許多缺點，但是長處多於短處。做事固然也有些缺點，但是短處多於長處。這便是我自己對自己的總評。



(四)

記周佛海先生





## 記周佛海先生

左 筆

在舊曆新年久陰乍晴的一天，記者承『古今社』朱社長的介紹，特往拜謁大名鼎鼎的『和平運動總參謀長』（註）周佛海先生。

愚園路中一所半新半舊的洋房，前面包圍着一片小小的草地，那便是周先生的寓宅。記者投片之後，就在樓下的小客廳裏恭候。客廳的四壁懸着汪精衛先生的字和齊白石老人的畫，鐵劃銀鈎，令人神往。廳裏略具椅桌數事，簡單整潔，幽靜異常。當記者正在鑒賞一切凝神靜思之時，不知不覺的忽然周先生已跑進客廳裏來了。

一位體格壯偉英氣逼人的周先生，與記者往日腦筋裏所幻想的年齡很大而道貌岸然的周先生截然不同！周先生的大名至少我已欽仰了二十餘年之久，遠在新文化運動時代，記者就已在國內諸大雜誌上拜讀他的大著，怎麼今日一見，依然丰姿翩翩還是一個青年鬥士呢？

寒暄之後，周先生即一見如故的與記者暢談一切。懇切的態度，爽利的談鋒，在短短的十幾分鐘之內，已將他的豪爽痛快的個性，充分地流露出來了。

據周先生自述，他生平唯一的個性，就是心裏有什麼事嘴裏就說什麼。他不曉得什麼叫做『謀』，更不曉得什麼叫做『術』。此外他還有『三不』個性：即（一）不修邊幅，（二）不事生產，（三）不好應酬。他說他最怕剃頭，不受逼迫是決不肯自動理髮的，所以常常要兩三個月才理髮一

次。一件衣服穿上身後就永遠的穿着，不是他的夫人要他換，他決不會換的。他自己不曉得寒暖，不知道飢飽，每天的飲食起居全是由他的夫人當心照料的。所以每逢他與他的夫人不在一起的期間，他常常要患傷風及胃病。

（記者按：這一點頗有餘杭章太炎氏之作風！）

對於金錢他是素來不很重視的，雖則他的幼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從極困苦的環境中度來。正因如此，所以他現在收入的大部分盡用之於救濟困難的朋友和不宣佈的慈善事業。他說這樣的用錢在精神上是極感愉快的。

他在南京是應酬最少的一個人。不是因為萬不得已，他決不請客；也不是因為萬不得已，人家請他，他決不到。人家知道他的脾氣，以後索性不請他了。所以他晚上是非常清閑的，時以瀏覽書報為消遣。有一天，德國公使飛歌爾氏請他吃飯，問他道：『每次公開宴會中，何以都不看見你？』他

說：『我今晚承你招待，來和你談談，在我是算很特別的。』湊巧第二天有個公開的宴會，德使說：『那麼明天的宴會，恐怕又看不到你了？』他說：『被你猜着了！』說罷兩人大笑。

周先生對於事業方面所感興趣的是政治訓練工作與文化宣傳工作。所以，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期，他做黃埔軍官學校武漢分校的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時蔣中正氏任校長，鄧演達氏任代理校長，張治中氏任教育長。）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年間，他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長。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他做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八一三事變後，他先在南京做大本營第二部副部長，（按大本營大元帥爲蔣中正氏，第二部所司者爲『政略』，部長爲熊式輝氏，此係戰時體制，始終未經宣佈者。）繼在武漢做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直至和平運動開始時爲止。他

說他生平所最怕做者有兩件事：一是外交，一是財政，因他的個性如上所述，既不長謀術又不事生產也。可是當和平運動開始的時候，他就是第一個辦外交的人；國府還都後，他又就第一任的財政部長和第一任的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可謂怪極。他又說他最不成興趣的亦有兩件事：一為教育，一為警察。當昔年初到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人勸他考高等師範，他不願意，又有人以為日本的警察辦得好，勸他學警察，他也不願意。可是後來在八一三事變前他在江蘇做了六年的教育廳長，國府還都後又兼任第一任的警政部長，亦可謂怪事。周先生說到這裏時，喟然長嘆曰：「天下事的離奇變化，真出人意外！」

後來談到個人的嗜好，他說最愛讀杜詩，看電影和遊歷名山大川。可是現在因環境和地位的關係，不能出去看電影和遊覽，至以為憾。談到此時，

記者偶然聽得隔壁悠揚的琴聲，一經打聽，原來是他的女公子在練習鋼琴。提起這一件事，周先生說最近有一個極爲幽默的笑話。原來周女士請一個俄國女人教彈鋼琴，有一天那個俄國女人問周女士的父親是何人，周女士隨手以一張中央儲備銀行鈔票上周氏的簽名示之，那個俄國女人失聲大呼曰：

“Oh, you have a good father!”

周女士立即以極流暢的英語答覆道：

“If he were a begger, then I shall have a bad father!”

在彼此哈哈大笑聲中，記者遂起身告辭，歸來後腦筋裏留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愉快而興奮的印象。

（註）日本報紙及雜誌上對於周氏俱作是稱。

(五)

訪周佛海先生一夕談





## 訪周佛海先生一夕談

書 生

一個偶然的機會，走謁周佛海先生於其寓邸，與座者皆為文化界人物，「古今社」朱社長樸之，亦是日座客也。暢聆偉論，印象良深，因就記憶所得，拉雜書之，工拙非敢所計，記實而已。——作者謹識。

讀了古今半月刊第九期周佛海先生的『自反錄』，便對於這位人物發生濃厚的興趣。自來的政治人物，總好比廬山的面目，不肯以真相示人；而周先生却這樣的率真，坦白地解剖自己。這種獨特的風格，即在西方政治家

中，也很難求得的。

周先生在我這樣身份——即以一個年青的新聞記者自居吧——的人，決不是一個生疏的人物，遠在國民革命時代，與我同樣年齡的人，都已心目中，有這樣一位人物的名字了，那便是周先生不朽的巨著——『三民主義理論的體系』一本書，凡是解釋三民主義的書，恐怕再不能好過這一本，讀過的人總是衆口一詞的。

周先生的演講，也是使人諦聽不厭的，他在江蘇教育廳長任內的公開講演，每次我必前往聆聽，只是不能有機會和他交談，並一覘他燕居時的風度，至今還引以爲憾事。

這一次居然因偶然的機會，承約到他的寓邸去談談，我便欣然命駕，不肯失却這次寶貴的機會了。

周先生是現任的財政部長兼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一般的想像，以爲他的

起居生活，一定是富麗無比的了。但我所投刺晉謁的地方，却是一幢半舊的洋房，門前一片小小的草地，會客的客廳裏，也是佈置得樸素無華，乍然一見，只當是置身上海中等人家的住宅而已；萬想不到主人翁却是一位掌理國家度支的人物。因此使我想起『古今』創刊號中左筆先生一文，說到周先生自述的『三不』個性：『一不修邊幅，二不事生產，三不好應酬。』誠非爲虛語。近代中國官吏之起居生活，鮮有不窮奢極侈者，尤以留學歐美回來的留學生爲最甚，像周先生這種以身作則的作風，實在是令人欽佩無已的。

有六七年不見周先生，似乎覺得他身軀高大了一些，衣飾還是那麼隨便，一襲縐袍，不脫書生本色，眉目間英銳之氣逼人，覺得包蘊着無限的豐沛精力。周先生的大名，雖已傳誦於人之口者二十餘年，但是他依舊是一個年青的戰士，一些不露出蒼老的形態來。

這時在座會見的人，連我已五人，都是文化界的人物。所以周先生一見，寒暄之餘，立刻把談鋒轉到文化上。周先生認文化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主要的命脈，國家或民族若沒有自己的文化，雖具備了其他的條件，於立國還是無助；反之，只要有文化的保存，則雖一時受着艱難，總有復興之一日。因此，在建國的現階段，什麼問題都無過於文化的保存和復興，大家不能捨本逐末而忽略這個問題。

周先生雖然不是政府的文化部分的主管長官，但京滬各大報除了官辦的中華日報外，他是國民新聞、新中國報、平報和中報的董事長，所以他對文化界之關切，是非常顯著的。他對於時下的出版物，差不多都會加以寓目，而且每一種都加以切當的批評。他認爲從前和平運動時期那種刊物已經過去了，而那種刊物成績之所以不大好之故，乃在於主辦者未能專心從事，以後

的出版物當然要實事求是，放棄這一種作風，而於從事復蘇文化着眼。現在的出版界，已很明顯的趨向這一條道路了。言下表示不勝其關切的樣子。

目下出版物風起雲湧的現象，周先生認爲是極好的。開這個風氣的，『古今』月刊的於今春創刊，無疑的可推爲第一炮。這時在座的該社社長朱樸之先生立刻表示謙遜之意，並謂『古今』之所以能尙有成績者，乃是全由私人辦理，故能以最少的資力，而發揮最大的人力。若一經官辦，便很難弄得好了。

周先生對於『古今』的批評，以爲『古』的太多，而『今』的太少，應該加些翻譯文章進去，使『古今』得以名副其實。這一批評是很對的，我的觀點也和周先生相同，但據樸之先生的解釋，認爲加入譯文，要破壞『古今』已成的風格，不如由古今社另行刊行一種刊物，專談東西方生活文化

的，周先生也覺得很以爲然。

周先生所密切關心的，不獨是和平區內文化的情況，對於各種有關文化的情事垂詢得很詳細，而且還十分關切着遼遠的人們。周先生說，他在民國廿七年任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的時候，與文化關係最密切的紙張，在內地已很見困難。現在過了三年，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東西來印刷報紙刊物，言下不勝其感慨的樣子。兵兇戰禍，真是文化的最大的敵人。

周先生現在雖然不是文化機關的主管長官，而是幹着他自認爲不合興趣的財務工作，但始終不會放下筆桿。所以一談起出版和宣傳的事業，他馬上回復當年文化戰士的姿態，全神貫注的暢論着。凡是他所指摘的和揄揚的，無不一針見血，全是內行人的見地。周先生戰前曾主持過『新生命書店』，出版轟動一時的『新生命月刊』，戰後又主持『藝文研究社』，出版了很多

種富有價值的『藝文叢書』，到現在還留下無上的成績。

座客中有一位，認為雜誌報紙出版的衆多而單行本刊行的消沉，乃是矛盾的現象，現在書籍的出版，簡直可以說是零，大衆所靠的精神食糧，只是把存書和舊書來充數，這樣下去，將來必有無書可讀之一日。而平時爲出版事業大本營的幾家書店，又都經濟斷絕，處此印刷材料高漲之日，無力印書，長此以往，實在是令人寒心的事。

周先生就說扶助文化，獎勵出版，本是政府應有的責任，假如出版界有什麼困難的話，儘可向政府商請援助。爲我們下一代着想，一定不能使文化界萎枯下去的。

談到這個時候，已費去周先生不少的時間，這天雖是星期日，但周先生還是有許多要務待理，我們只得起身告辭。在歸途中，覺得此行真是不虛。



周先生是湖南人，一夕之談，很令我領略湖南人的豪邁風度，絕似置身老湘營中，與曾左諸賢晤談。記得民初有一位先生會這樣說過：『有湖南人在，中國是不會亡的。』我在今日承認這一句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古今叢  
書之一  
往矣集

每冊實價四元

(特製本每冊二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著者 周 佛 海

編輯者 古 今 出 版 社

發行人 朱 樸

發行所 古 今 出 版 社

上海亞爾培路二號

.88  
.6